

学林

← (上接9版)

馆古籍部都有收藏,四库存目丛书影印。另有存世清抄本《快雪堂日记》一种,仅存五卷数,不及原日记一半,收藏于国图,《历代日记丛钞》丛书曾影印。不过这个抄本可能就是从刻本过录的,证据就是万历二十三年三月初十,冯梦禛在径山上听说憨山德清“乙未之狱”时记道:

闻严旨逮治僧德清者,即“憨山”也。盖以道官久毁,因盖佛屋,遂至此,可叹。

这里,刻本与抄本皆作“憨山”。略知晚明掌故的读者都知道,这起因改道官而作佛屋的僧案,显然就是高僧憨山德清(1546—1623),于青岛崂山所遭遇到的。“憨”误作“憨”发生的频率,应该不会太高,则二本之间的关联可以推知。

冯梦禛一生最高官阶,不过从四品的南国子祭酒,所历又无太多抱负与坎坷,但凭借近二十载日记的生活,他依然可以得到当今明代研究者的广泛关注。学界已有的黄卓越、丁小明等学者的单篇论文及胡玺、魏红艳等的专题硕博学位论文,从许多方面讨论了此种晚明日记所蕴含的内容与价值,让读者体会到了这位晚明士大夫丰富多彩的一面。甚至《快雪堂日记》还成为明清江南气候史研究者关注的对象。冯太史原本每天顺手记录下的阴晴雨雪,数百年后被视为气象史重要的数据,倒是颇有些出人意料。

证明自己身后的墓志铭被人写错,算是冯梦禛写下这部日记的另一意外收获。冯梦禛身后墓志铭,是由晚辈文坛领袖钱谦益(1582—1664)撰写的。牧斋在《南京国子监祭酒冯公墓志铭》中说冯梦禛“卒于万历乙巳(三十三年,1605)十月廿二日,享年五十有八”。正是由于牧斋的影响力,此说几成为定谥。冯氏的日记的确只到1605年农历六月,但同属日记文体的《乙巳十月出行记》,一直记录了当年十月、十一月的行程。所以不仅乙巳年十月廿二日冯梦禛依然在世,我们还能准确地了解那几日他的行程:因为幼子新娶,儿媳一月后需归宁,冯氏本人又有多场外地的丧礼要出席,当年的十月,他坐着船沿运河一路北向,吴兴、苏州、无锡诸郡都有停靠。就在十月廿二日当天,冯梦禛一行夜泊浒墅关。是夜,招待他们的钞关负责人叫刘戡之。此君家世颇可以一提,他是前南工部尚书刘一儒的长子;还有个更显赫的身份:前相张居正的女婿。这位低调的名宦之后,

给冯祭酒留下极好的印象,约了返程继续相聚。

如此一来,钱谦益的墓志铭显然是错了,研究者尝试给出过一些解释,也从冯氏老友丁元荐的文章中找到他的卒年日期可能是腊月廿三日,无论如何,从传世日记所载,纠正自己卒年的通行说法,无疑是日记主人值得庆幸的地方。

身份

作为一位文人士大夫,后来的国子监祭酒,公共领域里的冯梦禛,一直是学者与官员的身份示人。尽管存世日记中,成功避开了晚明政坛历次激烈的党派争斗,比如万历十五年的京察(他的日记写作始于二月京察后的四月),二十一年的京察(是年日记始于四月),二十六年“忧危论议”(片言提及同僚被贬),三十一年“续忧危论议”(次年初冯梦禛因得知自己崇奉的紫柏和尚瘦死锦衣卫,才在日记里留了一笔),但他确实也曾以祭酒的身份结纳士子,整理典籍,刊刻旧史,就连不为后世所熟悉的“时文”教学,也被研究者拈出——当然,作为科考第一名的冯梦禛,对自己的时文能力与品位,是相当自信的。

到了私领域之中,冯梦禛则能兼各种有趣身份于一身。比如,作为一个戏曲评论家,冯梦禛显示出自己不低的品位,汤显祖、高濂、屠本峻、王骥德都与其过从甚密,屠隆更是他的同科好友,二人多次同赏屠隆所作名剧《昙花记》。《万历野获编》也记载了冯梦禛解屠隆《昙花记》的玄机;至于剧中主人公“木清泰”,是不是真的对应屠隆的相好“西宁侯”宋氏,那是观者自度了。

同时,冯梦禛是一位卓越的书画收藏家,不过我们看到用在冯氏别墅、别集中的“快雪”之名,并非是他真的收藏书圣王羲之的《快雪时晴帖》;那幅名作实际藏于其好友王稚登手里,冯氏在此,不过是借用一下现成的典故;用他自己的话说,是新房上梁时“积雪初晴”,所以才用此名。不过他对于宋元人的碑帖书画,仍颇有收藏,日记中记录到的藏品,就有宋拓高宗临二王帖、旧本《淳化帖》、李思训《长江六月图卷》等,而压箱底的王维《雪霁图》,连大画家董其昌也觊觎玩赏多次,至于宋版书《文选》之类的古籍,都不算显眼了。

日记还保留了许多冯氏相熟的收藏家与古董商人,及其



今天于杭州西溪重建的快雪堂,原址在西湖孤山,清朝毁。



冯梦禛像,取自清顾珂辑《古圣贤像传略》

手里传世的珍宝。除了王稚登手里的《快雪时晴帖》外,戏曲家高濂手里也藏了好多唐宋时的名作,每次相见,冯梦禛都要逼主人拿写出来以供玩赏,高濂的珍本郭忠恕临的《辋川图》、开皇本《兰亭集序》摹本,冯氏都曾多次寓目。

古董商人里面,有位人物值得标出,他就是著名徽州文人汪道昆、道贯兄弟的族弟,诗人汪道会,字仲嘉。身为名士的他,做起古董生意来,也一点不含糊。汪仲嘉一会儿展示泉州本《淳化阁帖》,让冯梦禛叹服不已(万历二十五年十月初三);一会儿拿来王羲之的《十七帖》,冯梦禛又一次爱不释手。当然,这位徽商的后裔与冯太史最成功的买卖,是把一块西湖孤山上的好地,卖给了这位冯大司成,成就了冯梦禛最得意的“快雪堂”别墅(万历二十五年十月十七)。

同时,冯梦禛还是个传统宗教的大护法,这一点在翻阅日记时非常容易看出。频繁地斋僧礼佛,复兴寺观,刊刻大藏,以及与各地僧道间的互动,显示出冯梦禛作为江南护法金汤十分称职的一面。甚至,向道士们请教长生、房中术的经历,他也忠实地保存在日记中(见拙作《晚明冯梦禛信仰的微分》)。只是,这些纷繁的信仰生活,不能被简单视作出于相似的出世或修行的愿望;比如冯梦禛参与高僧云栖株宏(1535—1615)放生法会的初衷,与其追随紫柏真可(1543—1603)与密藏道开师徒捐资刻藏相较,其背后就有完全不同的因缘际会与现实考量,并能真正体现信仰生活内外,晚明士大夫真正的安身立命之所。

宗教

中国佛教在晚明时代迎来

了一次久违的复兴,这次复兴的机缘是多方面的,其中有精英们广泛结交出家人,形成僧俗交涉的公共场域;也有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后,继发的信仰需求,甚至,藏传佛教的僧团与教义,也为汉地佛教注入了学术的活力。此外,仍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外部动力,此时的高僧与教团得到了宫廷的支持。神宗皇帝的生母慈圣太后,因其佞佛的举动,而被视为当时佛教圈的转轮王再世,世俗间的第一护法。她藉内宫之力,向僧团提供庇护与檀施,整个帝国的佛教生态因之发生了质的改观:寺院得到复建或新修,高僧受到隆遇,甚至可以出入禁宫,得到世俗无尽的崇奉与敬仰,著名的“万历三高僧”,就是那个时代精英出家人的代表。而作为高僧们的同龄人,冯梦禛同时与这三位尊宿都有交往,这一点,日记里有明确的记录。

与高僧们为方内交的慈圣李太后,在丰富的宗教生活之外,还尽情地施展她作为母后临朝的权力游戏,而其中的一些举动导致与小皇帝母子失和;在神宗皇帝成年后,这些内闱龃龉,逐渐酿成巨大的政治问题,尤其是神宗储位选立这一关键问题上。因为神宗正宫王皇后不能生育皇子,而郑贵妃得不到慈圣的认可,连带着郑贵妃的儿子福王朱常洵也遭到祖母的排斥。福王的哥哥皇长子朱常洛,即日后的明光宗,虽然出身远逊三弟,却一直保有祖母的支持。陈寅恪先生说过,晚明党争的源头就是万历朝为立储展开的“国本争”,而对峙的双方,分别是支持光宗的后党,与支持福王的帝妃党。后党拥有“立长”这一古训的道德制高点,而聚拢了一批清流进士。他们频繁用自己的政治生命相搏,向皇帝进谏早日立皇长子,这其中的许多人,都在《快雪堂日记》中出现过身影,如卢洪

春、姚思仁、陈禹谟、万国钦、张栋等等,作为他们的老友,冯梦禛支持清流的态度也是显而易见的。

诡吊的是:因为有慈圣太后存在,依附于其中的僧俗精英们,则被迫在许多关键事态中站队,比如高僧不得不亲自参与到“国本争”的泥潭之中,而朝野士大夫亲近佛教与特定高僧群体,也一并成为某种政治站队的考量;护持佛法,尤其对京师、五台山等处皇家寺院的礼敬,在万历朝俨然成为某种政治清流的代表而得到表彰。大学士张位,吏部尚书陆光祖、曾同亨等高官,都是这种佛教护法与清流士大夫的结合体,祭酒冯梦禛,亦复如是。

即便隐晦如《快雪堂日记》的文字,我们依然能够发现冯梦禛积极参与五台山刻方册大藏的举动,以及在之后大藏南迁余杭径山前后,所付出的努力。当日佛教僧团领袖之一、慈圣太后方外交紫柏真可,就视冯梦禛为法门金汤。自唱缘刻藏伊始,冯梦禛为协助紫柏高弟密藏道开,二人互动频繁,显示出冯氏对佛教信仰与清流立场的双重认可。期间,慈圣太后派出高僧南下,送北藏大藏经至天台山,冯梦禛尽力为其安排从杭州东去的行程(日记万历十五年六月二十一),在吴兴城山与密藏道开亲自会面讨论刻藏前期安排(日记万历十六年十二月十八),与道开及其师弟幻居,一同考察径山诸刹,作为五台山经场的备选(日记万历十七年正月初十),与密藏一同商定南方檀施供给(日记万历十七年四月二十)等等。此次方册大藏的宏业,可以视作紫柏大师师徒保国运、示好内宫的绝佳举动,其政治意义毫不逊于大藏经的宗教意义本身。从嘉兴藏准备期的万历十四年,至五台山经场南迁的万历二十年,冯梦禛大部分时间

(下转11版) →